



杜高 /著



作家出版社

周洲

生命在我



藏书 杜高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在我 / 杜高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063-7444-6

I. ①生… II. ①杜…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9786 号

生命在我

作 者：杜 高

特约编辑：石 湾

责任编辑：林金荣

装帧设计：张晓光

封底篆刻：钱君匱

责任印制：李大庆 李卫东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30

字 数：230 千

印 张：16.75

印 数：001-8000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44-6

定 价：36.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杜高 湖南长沙人。1930年出生于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加入进步儿童文艺团体，后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并学习写作。少年时即有习作发表。1949年后，发表剧本、文艺评论、通讯报告、散文随笔等多种体裁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后，连续遭受政治运动打击，半生坎坷。1979年，错案得到改正，重返工作岗位，恢复文艺写作。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戏剧》《当代电视》杂志主编、中国文联全委等职。

上世纪末，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被发现，后公开出版，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我时时记在心里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句话。他说：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

—— 题 记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杜高档案 /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2
致李辉	31
——读《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有感	
附录一：杜高档案收藏散记（节录）/ 李辉	33
附录二：我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 / 丽江	38
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	48

第二辑

失败的“剧本创作室”	56
悲欣交集 重归剧坛	67
——我在破冰解冻的日子里	
我们经受的历史伤痛	78
——怀念亡友王正和肖里	
附录：契诃夫悲剧的幕后	86
荒原上的瞬间一笑	92
劳动教养：比路还长的回忆	100

第三辑

一个受难者的灵魂	118
——为《路翎剧作选》出版而作	

路翎的死	127
吴祖光：一个中国文人的生命价值	131
阅读吴祖光	140
——读《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有感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146
昨日的人生：蔡亮和我	156
施咸荣和《等待戈多》	181
——2004年11月8日在“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附录：我收到的第一封信 / 施亮	184

第四辑

美被毁灭的悲剧	192
——严凤英之死	
田汉：人格的独特魅力	197
永生的舞人	202
——悼念吴晓邦先生	
俄狄浦斯的灵魂	206
绝不向强权低头	213
——马寅初艺术形象的启示	
和钱君匋先生的三次会见	218
忘不了的孙维世	224
——读《唯有赤子心》	
“人”的赵丹和“演员”的赵丹	235
——从电视剧《赵丹》想起的	
华君武的道歉和自省	241
附录：不朽的皮诺乔	252
是什么使我们心灵颤栗	255
——话剧《深度灼伤》演出的意义	



第一辑

杜高档案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杜高

访问时间：2005年3月16日

上 篇

陈晓楠：在中国大陆，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档案里记载的是“组织”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鉴定和评价。而每个人的档案都按照级别、系统等等储存并保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档案是非常神秘的。由于有着极其严密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人们不可能自由地翻阅自己的档案，而受到严格控制的档案材料也更不可能流散到社会上。

然而，就在1998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份被装订成册，厚达六卷，几十万字的个人档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旧书摊上，被当作文物待价而售。档案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杜高”，很显然这是一个名叫“杜高”的人的个人档案。

杜高：在1979年的春天，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的时候，正式告诉我，向我宣布，这份档案已经全部销毁。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五十多万个右派，还有“文革”中受到磨难的，受到冲击的干部，他们所有的政治档案全部销毁。这是中央决定的，因为这是不实之词，那么我



陈晓楠

以为这个档案已经销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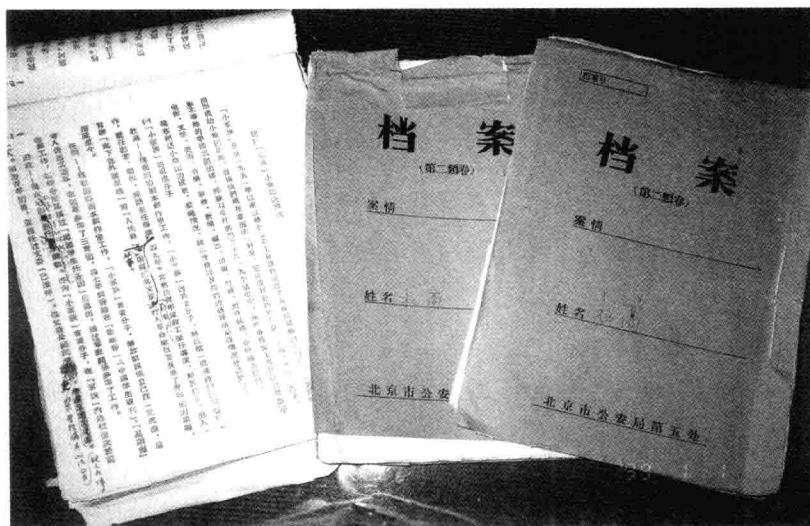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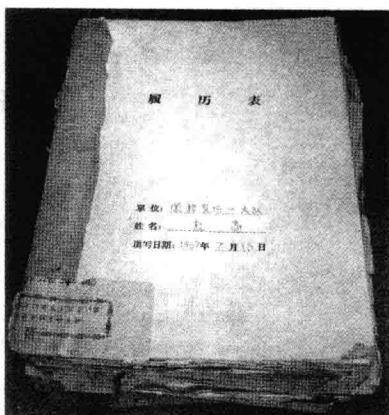
解说：但是，这份在杜高看来本已销毁的档案并没有化为灰烬，而是流散到社会上，最后出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这份档案的是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李辉先生。这位喜爱寻访旧书摊的青年学者在见到这份档案后立即买了下来。恰好这个时候，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反右”运动中“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专著。在随后发表在《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里，他使用了杜高档案中的一些材料。杜高在看到这期报纸后，与李辉取得了联系。在李辉那儿，杜高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档案。

杜高：我亲眼看到了我的这份档案，这一份对来说来是非常神秘又非常可怕的，跟随了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档案。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笔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写的，对我的揭发，对我的检举。这些材料我都看到了，我震惊了，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档案。

我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感觉到一个历史的影子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到呼吸都有些急促，我的情绪应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想

不到的，特别是有很多批示，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来对待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档案是从1955年开始，那个时候，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很单纯的那么一个青年。

解说：杜高可以说是少年成名。他十二岁起就发表散文，十四岁开始发表剧评，十九岁就担任《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



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的“杜高档案”文本

集。1952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后，被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第二年，杜高进入刚刚成立的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在创作室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个创作室老中青结合，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而在杜高身边，也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青年朋友。

杜高：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都做着艺术的灿烂的梦，我们都怀着很美好的理想，很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从事的专业上，能够做出一些贡献。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谈读书，谈看戏，在一起玩，我们成了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汉，都没有成家。

这是1954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指着画面上的照片），这个人叫罗坚，这个人叫田庄，这个人叫蔡亮，这个人叫汪明，中间这个是我。现在就只剩下中间的这个人了。当时笑得多灿烂！那真是很年轻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讲，是充满阳光的岁月。



当时笑得多么灿烂！

陈晓楠：在20世纪50年代，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在文艺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他们身上涌动着青春的激情，他们自信会拥有美好的前程。但是，随着1955年的一场“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这群一心沉醉于艺术之梦中的天真青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卷入到政治运动的漩涡当中。杜高的档案材料就是从这场“肃反”运动开始的。这一年，杜高二十五岁。

解说：“肃反”运动的前奏就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声讨。1955年，以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遭到震荡的开端，也正是这个运动导致了杜高整个中青年时代的灾难。

杜高：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跟我住在一个小楼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很勤奋很有才华的作家，我非常爱这个人，他就是路翎。我跟他住在隔壁。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所以是很好的朋友。没有想到的是，1955年，他由于和胡风先生的关系，被作为胡风集团最重要的一个分子，开始批判他。

解说：路翎受到批判，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处境也十分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和路翎关系密切。尽管他们与胡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没有见过胡风本人，但是灾难还是落在了这群年轻人的头上。

杜高：到胡风问题一爆发，我们都被隔离审查，要我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胡风是怎么指示你们的？你们是怎么为胡风服务的？你们是怎么执行胡风的指示，来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吓得不得了。我后来听说，把蔡亮关起来的时候，他那时才二十岁啊，是美院的研究生，他都吓哭了。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胡风啊，我讲得出什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陶冶，他在文化部工作，文化部对外联络局的，做对外文

化联络，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他那时和周而复、郑振铎他们出国访问去了，回来一下飞机，来了两个人，把他直接带回文化部，不许他回家。他问，怎么了？那些人说，要你交代跟胡风的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胡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交代什么呢？那个人马上掏出公安局的一个什么证件，说，你交代杜高、汪明给你的密信。因为胡风集团是从他们的密信开始揭出来的。他一听就知道糟糕了，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他也马上被隔离起来，知道自己陷入一个很大的政治案件里面了。

陈晓楠：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派人强迫杜高搬家，从青艺宿舍搬到了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面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后来杜高才知道，这里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刚从这里被公安局逮捕。杜高搬进来之后就失去了自由，开始隔离反省。而他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等人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在当年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被打倒者往往会被冠以某些特定的名号，这一点上，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名号是“小家族小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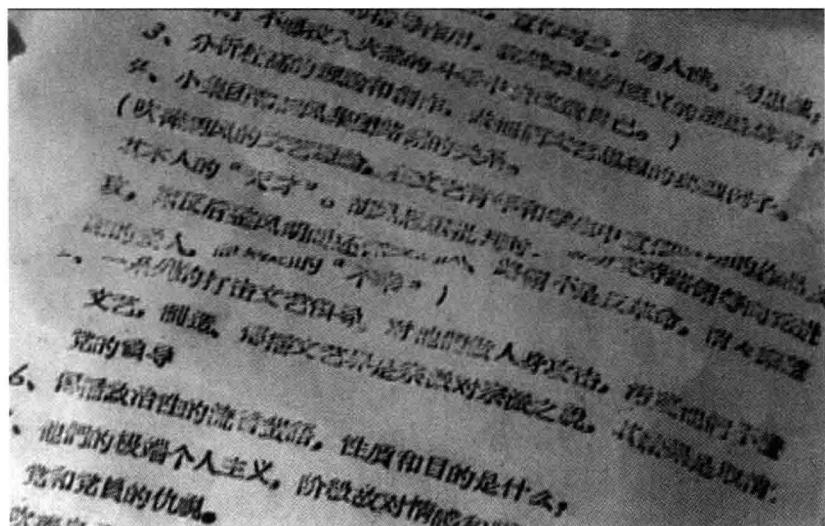
杜高：因为胡风是一个集团，然后一看我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就想这也是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叫“小家族”，说我们是个“小家族”。为什么叫“小家族”呢？大概是哪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随便那么说的，说我们都是一群流浪儿童，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一个“小家族”。这样，不知道谁这么说起来的，后来就叫“小家族”，那么人家一听，这个小集团还有个名字呢，那不更好吗？那么就开始深挖，就各个击破。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杜高在1955年7月31日写的《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杜高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真诚态度。而在另一份专案组的上报材料《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中，它们已经演变为

“小家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了。

杜高：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写了很多材料来交代，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说话是非常随便的，无所顾虑的，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消息，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都是文艺界的一些消息吧。那时认为是不许谈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叫作流言蜚语，说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这就严重了。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党提倡的是革命集体主义，而我们这些人是表现自己的个性，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解说：同任何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属于年轻人的弱点和缺点：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杜高曾经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相互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但就是这样一句话，不知被谁检举揭发，经过专案组的改造，变成了“小家族集团”的“政治纲领”，含



义就是“小家族”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在杜高的档案里，像这样的检举材料比比皆是，就连他十六岁时写的文章都成了他反革命的物证和罪证。

杜高：到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档案的时候，我才懂得政治运动的档案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收集了这么一大堆材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劳改了，他就不能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些革命表现的，那些材料都不要了。他就专门抽那些对你不利的，哪一点是讲了一句对共产党不满意的话，或者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些材料。所以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我原来想不到的。我以为一个人的档案应该是反映他的各个方面，很全面很客观的，但不是这样，档案是按照运动领导人的意图，经过选择，经过编选，经过改造的。

解说：在隔离审查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之外，杜高还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杜高：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群众斗争会。在我们机关里，由剧协的一个副秘书长来主持这个斗争会。他宣布，把反革命嫌疑分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给我定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进来！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带进去，让我站着。那个时候很热啊，1955年的夏天，非常酷热的天气，我一直流着汗笔直地站在那里，要我交代跟胡风的关系。然后大家呼口号，你不老实什么的。我感觉到这个斗争会，倒不是呼喊口号的那个声音，要打倒你呀，要你交代问题呀，你老实点呀，这些话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比这更刺激我、压迫我的是会场上一些人的那种表情，因为开斗争会的那些人啊，都是机关里面原来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但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你在挨斗，他在嘲笑你，他对着你笑，你越狼狈，他越高兴。这种人对人的冷酷，这个给人造

成的心灵伤害呀，对当时的我，对我的自尊心的伤害，真是很惨重。

解说：到了1956年10月，也就是在杜高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总算有了个说法。

杜高：给我的结论说：这是几个青年，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就这么个结论，给我们行政降级处分。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摆到我的档案里面去，因为没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没有给我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只是说我们思想落后。他不能认为搞了你十七个月呀，搞了一年半，不能说全搞错了，他不能承认这个搞错了，于是又说我们思想落后，说我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挑了我几个作品吧，几篇文章，说我有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说我搞那个小圈子活动吧，那么给我行政降级处分。

解说：与此同时，“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分别受到处分。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分配到西安、贵州等地。经过这场运动后，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形影不离了。不过，“肃反”结束后，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但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又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陈晓楠：在杜高的档案原件当中，还塞着一张日期表明是1955年8月12日的一张小便条。这一天，杜高正在群众斗争大会上接受批斗。而这张便条里面，提到了吴祖光、黄苗子的名字。实际上，这一张小纸条的出现，可以说预示了另一场运动的来临，其中的一个大案就将会涉及戏剧家吴祖光等等另外一大批的文人。而和吴祖光关系密切的这个所谓的“小家族集团”自然也脱不了干系。1957年春天，刚刚恢复自由的杜高被安排到成立不久的戏剧出版社。这一年的年初，费孝通先生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春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就在这短短的春日里，杜高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几件事情。他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看望了路翎的夫